

## 閱聽人概念的探索：從網路經驗出發\*

張玉佩\*\*

### 《摘要》

不同的傳播研究典範經常賦予「閱聽人」不同的意涵。本文以閱聽人的主體性為核心，分別從閱聽人研究之行爲典範與接收分析典範進行檢討，從網路社群的實證經驗觀察分析，提出閱聽人的概念應回歸到人的本質，承認其多元、流動與混雜交錯的身份認同位置。文末並對未來閱聽人研究提出三點建議，一、應思考後現代主體的可能，二、關注閱聽人於反身性思考時的跳躍，三、重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權力流動。

關鍵詞：方法論、接收分析、閱聽人、閱聽人研究、網路

智慧藏

---

\* 本文修改自作者博士論文，感謝指導教授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翁秀琪院長於論文概念發展的眾多啟發。此外，特別謝謝二位匿名評審與編委會的斧正，協助本文釐清問題意識與論證邏輯，本人受益匪淺。

\*\* 玄奘大學大傳系助理教授。E-mail: yupe@hcu.edu.tw

「閱聽人」(audience)的概念在傳播研究社群，已經儼然成爲一個被架空的符碼，不同研究典範爲了強調不同的理論視野，經常賦予不同的意義內涵。Anderson(1996)曾經稱此種因應學術研究創造出來的閱聽人概念爲「分析性閱聽人」(the analytic audience)，女性主義者的閱聽人是生活在父權社會下的閱聽人，文化研究的閱聽人是敘事主體的再現，後現代主義的閱聽人則是破碎與不連貫的個體。Hay(1996)更進一步指出：

將「閱聽人」視爲一個符號(semiotics)，提醒我們，這是一個便利(convention)產物的客體與概念，「閱聽人」符號(sign)是一個印記(marker)，……是鬥爭的客體(the object of a struggle)而非具有清楚的定義，這個鬥爭隱含著閱聽人得以被研究本身與研究生產位置加以重新組合。除此之外，閱聽人並不存在於任何地方，它完全是一個相對概念，足以讓各式各樣的研究將意義填入。(Hay, 1996: 359-378)

現今發展成熟之閱聽人研究典範，可以區分爲兩大主流，分別是行爲典範(the behavioral paradigm)與接收分析典範(the reception analysis paradigm)，學者經常以量化與質化等兩大方法論作爲其區別的方式(Jensen, 1996；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Schroder, 1999；郭良文與林素甘，2001；黃光玉，2002)。然而，傳播研究典範的閱聽人概念，隱含著其研究典範對於人的本質預設。當研究典範預設科學真理可以跨越時空環境存在，研究者必須摒棄任何價值判斷、使用純粹中立的語言來描述真實之時，作爲被傳播研究觀察客體對象——「人/閱聽人」，便被視爲個別的、獨立的、原子化的，可以相互加總，運用數學統計法則加以運作推算。同樣的，當研究典範預設大眾傳播媒體是整體國家意識形態運作底下之一環，媒體文本背後隱藏著一套歌頌主流意識形態、試圖納編大眾的主體思考之時，閱聽人便成爲與傳播媒體共同進行零和遊戲的對象——「不是你（主流意識形態）贏、就是我（閱聽人）輸」。

行為典範則為前者的代表，而接收分析典範則為後者的代表。

本研究將從分析行為典範與接收分析典範對於閱聽人概念開始，檢討不同閱聽人研究典範對於人的本質預設與觀察研究依循的方法論觀點，並輔助實證經驗資料的觀察分析，指出前二典範對於閱聽人作為「人」的基本概念過於簡單，未能關注到「閱聽人」之所以為人的多元性與特殊性，進而提出，閱聽人研究應試圖「閱聽人」的概念還原至多元、流動、複雜的認同位置。

## 壹、行為典範

### 一、效果研究、涵化理論以及使用與滿足理論

行為典範源起於美國實證主義風潮，從早期 1930 年代佩恩基金會 (Payne Fund Foundation)<sup>(1)</sup> 保守的社會人士擔心電影此種充滿愛情、犯罪與性議題之新媒體會對於兒童身心造成不良影響，研究者試圖藉由各種可量化的行為表徵之觀察如看電視的時間，瞭解並預測媒介對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 (Lowery & De Fleur, 1998)。

延續佩恩基金會而來的美國傳播研究，受到統計學與量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成熟之影響，包括 1938 年普林斯頓大學 H. Cantril 等人的《火星人進攻記》研究、1940 年與 1948 年 P. F. Lazarsfeld 於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的選舉研究、1949 年與 1953 年 C. I. Hovland 於耶魯大學進行的說服實驗等，均關注傳播的短期效果，將閱聽人視為接收訊息的受眾 (receptor)，試圖從訊息內容結構或閱聽人的社會範疇（如種族、年齡、性別或教育程度）瞭解傳播效果。

效果研究發展至今，以 G. Gerbner 於 1969 年提出的涵化理論 (cultivation analysis) 影響最為深遠。涵化理論反轉美國傳播研究對於短期效果的關注，將傳播媒體視為現代人社會化過程的重要因素，人們日積月累接收大量來自傳播媒體的訊息，進而內化為自我的觀點，因此，

傳播媒體成爲人們觀看世界的重要窗口，接觸愈媒體內容者，其世界觀與媒體內容呈現愈相似。於此，涵化理論開始關注人們主體性養成與外在社會結構長期互動的結果，重視符號文化的影響，因此 Gerbner 的研究又被稱爲文化指標研究 (the cultural indicators approach)。

大體而言，效果研究是從媒介的角度，試圖分析不同的媒介內容對於人們產生的不同效果，此時，閱聽人可稱爲「受眾」，他們被視爲媒介訊息內容的接收器，閱聽人個體思維的差異不被重視，閱聽人成爲研究的客體而非得以主動思考的主體。朱全斌(2001)認爲效果研究將閱聽人視爲具有相似特徵集合群體的做法，是「貶抑主體性的閱聽人研究」(p.71)。

使用與滿足理論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 research) 是另一支有別於效果研究的重要行爲典範。效果研究以媒介作爲起點，探討媒介對個人造成的影響；而使用與滿足理論正好相反，以個別閱聽人作爲研究起點，詢問人們使用媒介的動機與其獲得之滿足。Blumler & Katz (1974) 指出，使用與滿足研究認爲閱聽人主動基於他們本身的心理或社會需求使用媒介，大眾媒介是滿足人類的需求之一，它必須和其他來源（如人際傳播）競爭，但閱聽人是媒介的主動使用者，閱聽人使用媒介來滿足需求，而不受媒介影響。基本上，使用與滿足理論援用 A. Malsow 的心理需求階層觀點，認爲人們除了追求基本生理溫飽以外，尚且具有追求更高層之自我實現需求，而媒體使用正是人們用來追求超越自我的工具，人們透過此種高峰經驗學習，跨越物質享用與個人歸屬階層，象徵人格臻於成熟。

「主動閱聽人」(the active audience) 概念，是使用與滿足理論最受人矚目的觀點，它強調閱聽人會跟隨著不同的社會心理需求而選擇性閱讀、選擇性接受或選擇性記憶不同的媒介內容，因此媒體使用具有可滿足人們消遣娛樂、社交活動、個人認同與監督環境等需求的功能。此種強調功能解決取向的功利性主動閱聽人<sup>(2)</sup> 觀點，備受眾多學者批評。Roscoe et al. (1995) 認爲使用與滿足的主動觀點，是一種「社會性主動」

立場，人們佔據(inhabit)特殊社會空間，而此空間是由他們的階級、種族與性別所決定，閱聽人帶著自己社會位置特有的「社會包裹」(social baggage)、透過自己特殊社會位置、帶著自己的經驗與知識來進行解讀。Gray(1999)更批評此種閱聽人是「被決定的主動閱聽人」(the determined active reader)，閱聽人的主動性是由其所佔有的社會空間所決定。

因此，雖然使用與滿足研究將閱聽人的主體性納入研究論述，認為閱聽人堅強的社會主體性是不受媒介內容影響；但卻認為此種閱聽人主動性是由其社會位置所決定。以 A. Giddens 提出之結構二元論(the duality of structure)的觀點<sup>(3)</sup> 來看，效果研究將限制閱聽人形塑自我主體性(agency)的結構(structure)視為是大眾媒體，而使用與滿足研究則以閱聽人的社會位置作為形塑其主體的結構，二者均強調外在結構的力量而忽略閱聽人主體思考的能動性。

## 二、跨時空存在的先驗閱聽人

效果研究、涵化理論以及使用與滿足理論等傾向於行為典範的閱聽人研究，在本質論(ontology)是源自於西方啓蒙運動對於人性預設的影響，其主體觀基本上是預設個人存在著一個先驗、統一的主體，具有真實、根本的自我存在，笛卡爾(R. Descartes, 1598-1650)的懷疑論強調人們只要能夠去除心靈偏見、保持懷疑態度、強加反思能力等，就能夠成為具有自主理性的主體。Blaikie(1993: 13-16)曾經將此種屬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傾向的世界觀，歸納出五點特徵：

1. 現象論(phenomenalism)：實證主義稱頌經驗的不可取代性，認為經驗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基礎。知識必須植基於經驗，觀察者必須根據自身的感知出發，但此感知必須是沒有認知主體的參與，也就是說，必須是沒有意識(empty consciousness)的「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

2. 唯名論(nominalism)：反對任何超越經驗而存在的知識，不做任何形而上意義思考的事物，例如「上帝」的概念，就因為沒有實質可見

的證據可以證明祂的存在，因此祂不能作為科學討論的事物。此外，用來描述觀察的語言必須是純粹反映「真實」。

3. 原子論 (atomism)：觀察所得的經驗被視為是個別的、獨立的，事件的原子化概念成為事件組織的終極元素。

4. 概推的法則 (general laws)：科學知識的目的是在尋求一個普遍存在的法則，可以用來連結各個觀察現象的整體，尋求因果關係。

5. 價值判斷與規範陳述 (value judgments and normative statements)：必須將「事實」與「價值」分開來，拒絕任何價值判斷。

因此，實證主義認定的事物本質是原子化的、抽象的、可觀察的事件所組成的秩序整體，這個秩序可以用普遍命題或一致性的宣稱表示，只有像經驗一樣可觀察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值得科學家注意研究的，因此人類活動被視為發生在可觀察的、物質環境下的可觀察行為，社會真實被視為是由事件組成的複雜因果關係，可運用變項間的關係進行預測。

因此，閱聽人作為科學研究的客體，它必須是可實際觀察的經驗對象，Anderson(1996)稱此種方法論下的閱聽人為「先驗閱聽人」(the transcendent empirical audience)，用以強調超越時空限制、可進行概推或歷史性稱謂的閱聽人概念。此種先驗閱聽人概念，是建立在平等單位 (equivalent units) 的規則，所有的男、女、成人、小孩都被視為是相等的，並可相互加總。大部份的理論和商業實踐都建立在此種先驗性，每一個平等的單位都是完整的、自動的，在結果與決定上是相似的，單位與單位之間不需要連結。此種以量化形式呈現的敘述方式，將閱聽人塑造成抽象、不可捉摸的一群人。

Anderson(1996)提出先驗性閱聽人有二個特點，第一是聚集 (aggregate) 的，經過某些抽樣的程序與定義來聚集閱聽人，如問卷調查中的「18-49 歲職業婦女」，受訪者被發現符合此條件者，便可抽出代表實際閱聽人的存在，「一個 18-49 歲女性觀看新聞，就等於是『閱聽眾的一員』，不管她的目的是陪先生看新聞或真的對新聞感到興趣，只

要她被選出來，就代表所有坐在那裡的可能理由」(Anderson, 1996: 82)。在此種抽樣情況下，「誰在那裡」(誰在收看電視)的問題變成爲「他們爲什麼在那裡」(觀眾爲什麼在看電視)的問題，分配率的差異成爲內容動機的差異。據此推論，連續劇吸引女人，是因爲連續劇的劇情浪漫，而不是因爲女性只有在那個時間有空、也不是因爲有沒有其他替代節目的選擇，更不是因爲在文化上設定女性愛看連續劇而男性不愛。事實上，聚集閱聽人(the aggregate audience)只能呈現暴露在媒介內容之前的閱聽人數目，無法告知閱聽行爲的目的。先驗性閱聽人第二個特點是代理(surrogate)的，由於研究的目的是要概推到人類普遍的特徵，因此研究對象(respondents)的特徵是代理全人類的特徵，是跨社會文化情境而存在。

先驗性閱聽人的代表是收視率調查，收視率是當代社會最常用來指稱閱聽人實體的方式。Morley 認爲此種以統計方法爲基礎的量化調查，將行動從脈絡中割裂出來，喪失彰顯行動意義的機會；將開電視等於看電視，忽略轉台及家庭生活的介入，誇大觀眾的注意程度；透過若干概括而標準化的收視行爲變項，獨斷描繪種種不同類型的觀眾與他們之間的差異，假設開電視對於所有觀眾都具有相同的意義及顯要程度，觀眾被當作是數字看待，個別的主觀差異被壓抑(馮建三譯，1995)。Hoijer(1999)認爲此種閱聽人是爲了滿足商業機構需要所生產出來的幻相，收視率調查將閱聽人視爲「集合性實體」(collective entity)，以累積性量化資料來呈現閱聽人，此種邏輯將閱聽人視爲商品而非經驗主體。Ruddock(2001)更指出收視率計算視閱聽行爲爲簡單的表面行爲，將人們簡單區分爲「看/閱聽人」與「不看/非閱聽人」等二種，但收視行爲並不是如此簡單，同樣坐在電視機前面的一家人，爸媽在看脫口秀，一個小孩一邊聽音樂、一邊燙衣服，另一個小孩看雜誌，以收視記錄器來看，四個都算是閱聽人；但事實上他們卻包含從完全專注到完全不專注的閱聽行爲。此種計算方式，讓閱聽人成爲商品，可以被廣告、販賣，商業電視台因此可以「生產閱聽人的能力」來吸引廣告商。

總結而言，在本質論上，行為典範延續啓蒙時期對於人的本質預設，如同 T. Hobbes(1588-1679)的「文明人」觀點一樣，認為未受教育或訓練的「自然人」只要經由適當的培育即可成為優秀公民，於此理性的觀點之下，認為人作為主體思考的可能是需要經過進一步培育。此種觀點，亦如葉啟政(2003)所云之「均質人」，他說：

透過諸如教育的社會化與治療、乃至監禁等等的社會控制的機制，人們更是具有著可予以「均質」化的機會（如具有理性判斷的共識）。（葉啟政，2003：43）

此種將人視為需要經由外力磨練才可鍛鍊其主體思考的做法，基本傾向於忽略閱聽人作為思考主體的能動性，要不是將研究焦點放在閱聽人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效果研究），就是認為閱聽人既定的社會位置決定閱聽行為的樣態（使用與滿足研究）。因其衍生的方法論，試圖透過客觀中立的科學研究方式，將每個閱聽人視為平等、可互通且加總的分析單位，藉由先驗閱聽人的聚集與代理特質，透過統計量化的準則，找尋可跨越社會文化情境、概推至全人類的閱聽行為模式。接收分析典範的出現，即是針對行為典範在本質論與方法論遭遇到的困境，提出另一套觀察閱聽行為的方式。

## 貳、接收分析典範

接收分析典範起自於製碼/編碼模式(the encoding/ decoding model)的提出，製碼/編碼模式最早出現於 S. Hall 在 1974 年英國伯名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簡訊第七期發表的〈電視論述中的製碼與編碼〉(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一文<sup>(4)</sup>。1980 年 Hall 正式提出三種製碼與解碼之間的立場：1. 主流霸權位置<sup>(5)</sup> (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觀眾受到優勢意義的操控，以文本的製碼意義加



以解碼。2.協商性符碼或位置(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混雜順從與反對因素，同時接受抽象、基礎的霸權定義，但在情境層次上，採取自己的規則，以例外來操作；也就是同意文本的優勢意義，但保留「在地情況」(local condition)的協商權力，採取特殊或情境邏輯(particular or situated)。3.對抗性符碼<sup>(6)</sup> (oppositional code)位置，瞭解文本的字面意義，但將優勢意義訊息加以拆解(detotalize)，並再以替代性的參考框架加以重新組合(retotalize)。Morley(1980)根據三種解讀位置，進行經驗性資料蒐集，試圖瞭解閱聽人與文本互動中的意義生產過程。

### 一、閱聽人尋求主體性的方法：抗拒

Hall 等人發展出來的製碼/解碼模式，對閱聽人研究領域帶來重大的改革，它引進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的概念，文本意義不再具有穩定的清晰度，媒介訊息不再像是一顆球一樣，可以由傳送者直接拋送給接收者；閱聽人本身所具有的知識系統會介入媒介訊息的解讀，與文本產製者共同形塑意義的生成。雖然他們認為主流意識形態會在傳播過程中強加某個符號領域，使得符合統治階級利益之意義系統較易為人們接收，造成大眾傳播媒體的文本中隱藏著受主流意識形態支配的優勢意義(the preferred meaning)，但是，閱聽人仍擁有主動與優勢意義對抗的力量，拆解優勢意義，尋求另一套解釋文本意涵的意義框架。此種力量，即是接收分析典範之研究者不斷汲汲找尋之閱聽人的抗拒(resistance)。

抗拒概念的提出，代表著接收分析典範對於閱聽人主體性的重視。與使用與滿足研究相較，使用與滿足研究認為閱聽人社會心理需求的差異會影響其閱聽行為，但是此種選擇並非強調閱聽人主動拒絕主流意識形態、解構優勢意義、重新賦予新的意義框架的能動性。接收分析典範強調意義是透過文本與閱聽人協商而來，閱聽人具有主動建構意義與歡愉的能力，此種主動性來自於閱聽人本身的主體意識，是閱聽人批判思考的展現。於此，接收分析典範肯定人有主動拒絕外來意義結構框架的可能，並積極尋求少數抗拒主流優勢意義之閱聽人類型，試圖從中瞭解

閱聽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對抗。

## 二、情境閱聽人

此外，在方法論上，接收分析典範引進來自人類學的民俗誌研究方法，重新將閱聽人與其身處的社會文化情境結合，閱聽人不再被視為單一、獨立、彼此相等、可以跨時空概推的統計單位，閱聽人本身的成長背景與時空差異被納入研究考慮；換句話說，即是閱聽人的特殊性受到重視。此種閱聽人的概念可以 Anderson(1996)提出的「情境閱聽人」(the situated audience)為代表。相對於先驗性閱聽人概念，情境閱聽人視閱聽人存在於不斷前進的社會行動，任何閱聽行為都存在著特殊媒介環境，因此不再如效果研究般努力找尋可預測閱聽行為的模式，他們試圖透過彰顯批判性案例(the critical case)中閱聽人所展現的閱聽行為與意義詮釋，進而瞭解主流意識形態如何透過符號系統滲透製閱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情境閱聽人的觀點，不再將人們視為具有同一面孔、可相互取代的研究對象，接收分析典範對於閱聽人社會文化背景與詮釋能力的關注，呼應其本質論上對於閱聽人主體性的重視。

## 三、權力一元論：簡化的二元對立

批判思潮的引進，使得接收分析典範藉由強調閱聽人可由政治抗拒策略獲得主體性；閱聽人採取對抗性閱讀位置，解構文本優勢意義，代表閱聽人具有抗拒主流意識形態的力量，也代表閱聽人主體性的成立。此種批判性立場是接收分析典範的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切開行為典範因過於強調媒介功能傾向而喪失獨立批判能力、淪為既得權力者用以維護現存結構不平等之符號框架的工具，批判立場使得接收分析典範重新重視閱聽人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抗拒。另一方面，接收分析典範的權力一元化立場，將社會文化簡單區分為主流與抗拒兩端，造成一種二元並置的現象，一方是霸權文化，另一方則是非主流次級文化，然而，並不是每個接受霸權力量預設者就代表屈從，也不是每個拒絕文本優勢意

義者就代表抗拒，此種二元分法無法正視權力的偶然性、在地性與破碎性，亦無法解釋文化消費與生產的複雜性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Murphy, 1999; Ruddock, 2001)。

此種簡化權力現象與閱聽行為的做法，成為接收分析典範思考閱聽人主體性最大的絆腳石。接收分析典範以抗拒文本優勢意義作為閱聽人獲得主體性的方式，但是這種做法首先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文本不一定具有一個統一的優勢意義，並非所有的媒介文本都具有清楚的結構或好壞分明的角色，文本的意涵經常是矛盾、曖昧含混、甚至彼此相互衝突。再者，即便文本存在某種程度的優勢意義，但此優勢意義並不一定等同於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價值觀與社會不同甚或相反的文本如女性主義文本（林芳玫，1996），其所蘊含的優勢意義即與父權意識系統相抗，在這種狀況之下，採取主流霸權位置的解讀才是抗拒主流意識形態的做法。

總括來說，接收分析典範將閱聽人主體性的獲得與否，歸因於其與外來文本之間的互動，並且預設文本優勢意義等同主流意識形態的做法，是將社會情境簡化為擁有權力者與被壓迫兩個陣營，造成權力兩端的激化，並無法真正瞭解閱聽人如何在複雜媒介景象、穿梭於不同類型文本中建立自我思考的主體性。

## 參、研究場域與初步觀察發現

為了瞭解閱聽人自我主體性的建立，本研究試圖於現實世界場域內蒐集足夠的經驗資料，以茲進一步觀察分析。經過初步資料收集與篩選，本研究認為閱聽人於網際空間(cyberspace)建立之線上身份(online identity)，是適當的觀察對象，一方面，不同於線下世界(offline world)的身份，閱聽人於網際空間中的主體建立，具有較大的自我操控權，他/她可以超越線下世界既定身份如容貌、身高、性別等實體限制，經營

其所欲展現在他人面前的身份面貌；另一方面，閱聽人並無法完全操控線上人格的建立，一些存在於意識底層的因素如知識素養、認同位置、書寫風格或對談語氣等均非可由人們自己完全操弄。在這種狀況下，本研究以發展成熟的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為主要搜尋對象，憑藉網際空間巨大的資料庫典藏特質，觀察閱聽人的主體性發展。而成熟的虛擬社群之定義，則是採取 Jordan(1999)對虛擬社群的定義，意指一群固定的網路使用者，不斷地返回相同的資訊空間，經由運用某些線上資源而創造出穩定的身份認同，此人們於網際空間所創造的身份認同必須具有得以讓另一個虛擬化身得以辨識其穩定的線上人格(a stable online personality)，辨識的來源可能是書寫風格、重複使用某個名稱或自我表述。

## 一、線上身份

經過層層篩選之後，本研究選取已成立超過四年、蒐集近二千篇閱聽人心得文章之村上迷群所組成的《村上春樹<sup>(7)</sup>的網路森林》(<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index.htm>)為主要觀察場域，並以開站 1998 年 8 月起，至 2002 年 8 月為止，作為主要觀察時間。本研究初步發現，閱聽人發表作品使用的姓名或筆名，是建立線上身份的首要基礎，本研究以據此進如初步觀察，將線上身分與線下身分之間的關係，分為連結與斷裂二方面來談。

### (一)線上身份與線下身份相互連結

線上身份與線下身份相互連結，人們可以從網路世界標示之線上作者名稱，直接連結至該作者之線下身份。

連結的方式，可再細分為二種：

1. 以現實生活之本名或筆名連結，例如賴明珠<sup>(8)</sup>、李友中、湯楨兆、楊照、盧郁佳、劉黎兒、徐淑卿、林水福、鄭樹森、水瓶鯨魚、許舜英、紀大偉、曾淑美、彭蕙仙、朱中愷等。

2. 於線上身份以筆名出現，但主動提出線下身份說明者。例如 Culture 自陳本名「朗天」，來自香港，正在撰寫關於村上作品與香港村上劇場的書。Julia Hsu 則在徵求站長對其撰寫碩士論文之同意權時，說明自己本名許均瑞，是日本大阪大學言語文化研究科研究生。銀色快手，說明自己本名趙佳誼，任職於出版社日文編譯。柯杰光則將其香港嶺南大學之畢業論文。

第一種以線下身份直接呈現於線上身份建立者，於真實生活世界均已建立既存聲望，享有特定權威，因此他們不須特別對自身身份多加說明，人們便能直接做出關連。以賴明珠為例，舉凡村上迷群，不可能不認識號稱「台灣村上代言人」的賴明珠，因此，毋須多加說明，人們便可直接判斷其身份位置。相較於此，第二種需要自己出面說明線下身份者，於真實世界尚未建立知名權威，一般閱聽人無法直接從姓名或筆名判斷其線下身份，但他們正在從事村上相關論述之建立，因此主動提出線下身份的說明。

## (二)線上身份與線下身份斷裂

線上身份與線下身份斷裂，指人們無法從線上世界標示之作者名稱，瞭解其線下世界的身份。然而，即便人們無法從線上世界判斷該名作者現實世界之真實身份，並不代表活動於線上世界之人們都是沒有面孔、難以辨認的，人們於線上世界活動時，同樣會藉由不同的行動來建構自己的主體認同位置，只是其建構方式不同於線下世界。線下世界所依循之外貌、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等傳統建構階層、找尋自我認同位置的資源，不再成為線上世界建構自我的方式；線上世界以另類資源，進行自我建構，例如「泥巴」世界或「天堂」等虛擬遊戲世界，人們以武器種類、寶物數量、武力等級等建立其線上身份。

相較於線下身份受限於實體限制（出生背景、成長過程、工作經驗等），人們對於線上身份擁有較大的操控權，雖然仍然存有某些無法放棄的既有特徵如書寫風格或知識程度等，但人們可同時使用數個線上身

份，隨意周旋於眾多線上身份之間，並決定每個線上身份的出現、消失或轉換。

由本研究之基礎資料發現，人們於線上身份的轉換，可分為直接轉換、間接轉換與潛藏轉換。對於線上身分轉換關係的瞭解，讓本研究得以追蹤閱聽人的思考歷程，並據此觀察思辨過程中的轉變。

1. 直接轉換，是指人們在線上身份的轉換過程之中，主動直接說明線上身份之轉換過程，如 MoonFish 說明自己先前的筆名「MoonMood」被人取笑拗口難聽，因此改為「MoonFish」，因此可推論 MoonMood 與 MoodFish 為同一人。再如 Eleven.cat、老兔子貓與七貓，因為其自稱於不同時間、不同目的使用不同筆名，因此亦為同一人。

2. 間接轉換，是指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留下某些線索，讓人得以追蹤其眾多線上身份之間的關係。例如遠流博識網綠蠹魚森林站長蠹魚頭，雖然於《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中，並無特別對其身份提出說明，但在查詢《遠流博識網》之後，發現蠹魚頭同時是「Just Do It」、「傅月庵」與「Who Am I?」，他同時於此四種筆名間轉換身份；此外，以日期追溯蠹魚頭發表文章之先後順序，也可以得知其間的轉變。

3. 線上身份的潛藏轉換，是指人們即便使用眾多線上身份，但並無直接說明或間接留下線索，以供研究者得以將不同線上身份加以連結；當一個人以眾多筆名於《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出沒時，他/她若是不欲讓他人知曉其線上身份的關係，只要小心勿留下任何線索，研究者無從判斷其線上身份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研究者並無任何根據可以判斷潛藏轉換之線上身份，因此，本研究以每個筆名為一個單位，視筆名為建構線上身份的表現。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區分方式，對於四年來(1998-2002)出現於《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之線上身份，初步統計出 416 個具有穩定線上身份之閱聽人，其中 31 個線上身份與其線下身份相互連結，其中 27 個使用與線下世界相同之名稱，另外 4 個為主動提出真實世界之自我說明。大部分的線上身份，是與線下身份斷裂，扣除其經由直接轉換（2 個）或間

接轉換（3 個）的重複現身以外，共有 375 個難以辨識其真實世界身份之閱聽人（見表一）。

表一：線上身份統計表

416 個線上身份	31 個與線下身份連結	27 個使用相同名稱
		4 個自我說明
	375 個與線下身份斷裂	2 個直接轉換
		1 個間接轉換
		387 個潛藏轉換/未轉換

此 416 個已發展穩定線上人格之閱聽人，共發表 1,815 篇關於村上作品的相關心得感想，每篇心得感想從數百字到數萬字不等，本研究依序與以編號標示。初步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 二、閱聽人素養的展現

線上身份缺乏實質身體(non-physical)的特質，使得人們可以於其間以字詞(words)重先建構「第二自我」(alter-egos)，此新生的第二自我生存虛擬世界的訊息傳送(互動)、被引用(繼續存活)、或貯存(休息)、或遺忘(死去)(Jones, 1998: 25)。爲了辨識閱聽人於虛擬世界展現出的線上人格，本研究試圖以閱聽人素養作爲主要判斷準則。

「素養」，由「素」與「養」二字組成。「素」，有根本、本質、平素、向來之意，亦指平素的行爲、修養及志向、願望等，《漢書·梅福傳》：「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其中「素」即是指平常的修養或行爲。「養」則指修養、涵養或教育、薰陶，宋何遠《春渚紀聞·叔夜有道之士》：「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慌擾。」，其中「養」是指修養與涵養；《禮記·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也。」，其中「養」則指教育與薰陶。「素養」一詞，則指修習

涵養，如《漢書·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以今日之言，即是平日的修養<sup>(9)</sup>。

「素養」的英文 'literacy'，源自於 'literate'，'literate' 指能寫、讀或具有知識與能力的（人），而 'literacy' 可解釋為具有寫、讀或某種知識能力的狀態或品質，同時也專指某種技能 (a skill) 或知識的累積 (accumulation for knowledge)，甚或世界觀的統稱（吳翠珍、關尚仁，1999）。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素養」一詞被運用到傳播研究領域，如「圖影素養」(visual literacy)，是指瞭解並使用視覺符號的能力（吳翠珍，1996）；「電子素養」(digital literacy)，是指瞭解並使用透過電腦、具有廣大來源、以複合形式出現之資訊的能力 (Gilster, 1997)；「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則指跨越媒體類型，強調瞭解訊息文本內容與產製結構的知識觀點 (Potter, 1998)。

本研究援用上述二者的定義，以「閱聽人素養」(audience literacy)，指稱閱聽人平時累積之知識經驗，用以進一步思辨媒介文本意涵與其社會運作機制所具有的修養與能力。但是本研究之研究取向，與傳統大眾傳播研究使用「媒體素養」之媒體教育研究取向不同。媒體教育研究者從全民教育的觀點著手，強調「養」之「教育」與「薰陶」之意，希望透過媒介組織、媒介型態、媒介科技、媒介的語言與文法、閱聽人分析與媒介真實與再現等面向的探討與瞭解，培養閱聽人作為現代民主公民所應具備的態度與能力（吳翠珍，1996）。但是本研究所指之閱聽人素養，強調「養」之「修養」與「涵養」之意，指日常生活經驗的個人特質養成，焦點在於人們作為閱聽人角色對於個人與媒介社會的反思，是從「實然」層面著手進行分析，而非如媒體素養研究者從「應然」層面著手。

本研究以閱聽人素養指稱閱聽人於線上世界建立的線上身份，主要是因為網際空間是由資訊 (information) 組成，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概念、價值、形體與事物，都必須轉換為資訊形式，才得以進入網際空間。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此轉換過程，原本於真實世界建立線下身份的部份



特質，如容貌、年齡、身高體重等有形物質因素，都成為閱聽人可以自行決定捨棄或重建的部份，而某些無形心靈特質，如說話語氣、書寫風格或知識背景等，屬於人們無法完全自我選擇或操控的因素。閱聽人素養，不止包含著閱聽人完全自主操控的主觀成分，更包括人們使用資訊形式建立線上身份時所無法完全自我操控或選擇的背景資源，它與閱聽人長時間養成的知識背景、理解能力與詮釋傾向有關。經由初步研究觀察，本研究認為該網站閱聽人可以分為迷群素養、美學素養與智識素養等三方面進行討論。

### (一)迷群素養

雖然網站上出現的閱聽人大部分屬於村上迷群，但仍存在少數非村上迷群者，若以支持村上與否作為劃分標準，可以將出現在《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的閱聽人劃分為三種，1.村上迷群，即村上擁護者，2.反村上迷群，即反對村上文化或村上文本內涵者，3.未瞭解村上作品者，如 Enjoy Dancing 上網請問「要如何去品味村上」。無論屬於哪一種閱聽人，至少都曾閱讀一本或一本已上的村上作品，村上迷群藉此開啓迷群旅程，反村上論者也因而展開對村上文化的駁斥，發出「看不懂」求救訊息之閱聽人也必須「看過」才得以認識「看不懂」的對象。因此，迷群素養的累積起點為一本村上作品之閱讀，隨著閱讀數量、廣度、深度與背景瞭解等，以扇形光譜狀向外延伸。

若將閱讀程度分為廣度與深度，廣度是指村上作品閱讀數量的累積，當閱聽人累積足夠的閱讀廣度之後，發展出綜合比較村上概念與意義詮釋的能力，進而展開閱讀深度的探索。因此，迷群素養隨著閱讀數量增加而增加，閱讀廣度的累積會加深閱聽人閱讀深度的探索。但因村上作品擁有眾多版本包括日文原著、英文譯本、多版中文譯本等，迷群將經常以比較版本間細微差距，作為閱讀樂趣。因此，深層迷群閱讀廣度的累積，雖以一本作為起點，終點卻像扇形般向外擴大，在不同相互版本之間相互加總、串連。當閱讀廣度累積到某個數量時，閱讀程度便

開始向下延伸，閱讀深度也於此展開。

閱聽人於循環文本展現的閱讀深度，分為二種顯現方式。第一種呈現閱讀深度的方式，是追蹤作品中某典故出處，以找出其於村上作品所隱含的意義；此種根據村上作品其它文本遺留的蛛絲馬跡，進而推究村上虛幻文本世界樣態的做法，本研究稱之為「村上考古學<sup>(10)</sup>」，例如綜合村上多本著作輔以現實生活時事編纂而成的村上世界年表（Evany & Julia）、為村上作品所有出現動物加以整理編類、撰寫出處的村上動物索引（李學文），甚至利用網路集結功能、集體進行作品解謎詮釋的「破解不毛作家哈德費爾先生之謎」（Evany & Julia；Alan；李友中）與「追尋老虎溶解成奶油典故出處」（Evany & Julia；Miya；海豚；九九；金紅；李友中；Jessica）。

第二種呈現閱讀深度的方式，是打破作品間的界限，重新探討某個不斷於各作品出現的主題如虛無、性關係之意義。由於村上作品經常是某個主題的不斷變調，因此，村上迷群得以根據某個主題，找出不同的變調文本，重新組織、分析與詮釋於不同作品出現的同一概念或意象；換句話說，即是環繞某個抽象主題或意象，進行的綜合詮釋。例如朗天、銀色快手、湯禎兆、朱立亞、吳聊、X、盧郁佳等，此類文本的書寫，凸顯出閱聽人的主體性，因為他們是環繞在閱聽人關心之主題與閱讀興趣，重新組織撰寫而成；村上文本於此成為閱聽人探討某個主題的工具資料，由閱聽人決定村上作品之間的關係，詮釋其意義與價值。

## （二）美學素養

美學素養，是指閱聽人藉由本身對於美學涵養的認識，將村上作品與其他美學作品交相比較或透過美學理論分析，凸顯村上作品的特色。本網站閱聽人呈現的美學素養則包括文學素養、電影素養與音樂素養等。

在文學素養方面，閱聽人的文學素養如同資料庫功能般，閱聽人藉由比對村上作品與其他文學作品間的異同，進而指出村上作品的價值或

詮釋村上作品的意義。因此，具有文學素養之閱聽人，不只是閱讀村上作品，尚且閱讀其他文學作品，並以其所有閱讀之文學作品形成自己的文學資料庫，於循環文本的撰寫時，展現綜合集結分析的能力。例如朗天比較村上作品《挪威的森林》與米蘭昆德拉《笑忘書》二者對於記憶的處理；水瓶鯨魚比較村上與山田詠美《做愛的眼神》、村上龍《料理小說集》、渡邊淳一《化身》、吉本芭娜娜《廚房》等對於食物的描寫與態度；阿樂比較村上作品與史坦貝克(J. Steinbeck)《憤怒的葡萄》，指出二者對於高度資本主義處理的態度；KillerSoft 與盧郁佳比較張愛玲與村上的文字風格、譬喻特徵與私人個性；駱以軍比較村上與卡夫卡的作品；紀大偉比較村上與瑞蒙卡佛的文字特徵。

文學資料庫的多寡豐富，成為判斷閱聽人文學素養程度的參照；閱讀文學作品的廣度與深度越大，則閱聽人就具備較豐厚的文學素養。此類文學素養的展現，除了零星比對不同作品間的價值特色以外，另有系統性的比較方式，如徐淑卿試圖分析村上對台灣創作風潮的影響，盧郁佳試圖從台灣文學界的發展，系統性綜合分析村上對台灣新一代作家的影響。

在電影素養方面，閱聽人經常累積電影閱讀經驗而獲取之資料背景，經由綜合比對村上作品之間的概念，重新獲得意義。例如湯禎兆環繞在日本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比對村上《約束的地方》與森達也導演之紀錄片《我在真理腳的日子》、Mark Schilling 導演之紀錄片《Contemporary Japanese film》之間，概念處理的差別。再如朗天以夢與現實為主題，比對德國電影導演溫德斯《明日世界中節時》與村上作品《聽風的歌》、《人造衛星情人》處理的差別。

在音樂素養方面，因為幾乎所有村上重要作品之重要片段，都有類似之互文音樂創造，因此閱聽人的音樂素養也成為其掌握村上作品文意的要素。具有音樂素養之閱聽人，較能感受村上描述的情境，如朱中愷、歆儀、Join。原本不具音樂素養之閱聽人，亦可能為進一步瞭解村上作品而加強自我的音樂素養，如李明龍、霏恚、林奇立等，其中霏恚即曾

經形容自己「像貓尋找吃剩的魚骨似地穿梭在我知道的每一間唱片行，手裡始終捉著幾乎脫去封皮的村上小說。」。

當閱聽人具有足夠的素養累積時，可對於既存之文本提出較為深層的批判。具有深度音樂素養與語言素養之閱聽人 Orpheus，具有深厚之音樂知識資料庫，並據此批評號稱「台灣村上春樹代言人」的賴明珠「不太用功」，將許多音樂專有名詞做出錯誤翻譯，如將貝多芬之「奏鳴曲(sonata)」翻譯成「協奏曲(concerto)」。此點在經由溝通之後，也得到賴明珠的道歉與更正。於此，基於專業知識所累積出來的音樂素養，成為論證的力量，得以確立閱聽人彼此之間的關係。

### (三)智識素養

智識素養，是指閱聽人匯集所有知識經驗與社會觀察，對於其自身與及生存的社會文化的思考感受，傾向抽象層次。本研究基於經驗資料的觀察，將閱聽人的智識素養分為二個部份，第一，基於閱聽人本身專業知識的訓練，透過理論性探索分析所養成的智識素養，例如從哲學角度切入的吳聊與趙學信，從心理學角度切入的湯禎兆與銀色快手，從文學理論角度切入的朗天、許均瑞、湯禎兆、川村湊、柯杰光等。

第二，閱聽人透過對社會文化樣態的觀察分析所培育出的智識素養，屬巨觀層次，是閱聽人對於其所生存的社會環境所展現的關懷。此類閱聽人通常試圖透過不同社會型態的比較，進而對於自己身處社會產生批判。例如身處於香港的湯禎兆有鑑於香港的村上流行現象的淺薄，討論日本「全共鬥<sup>(11)</sup>」時期對於村上作品的沉重影響，再如吳聊與阿樂透過村上作品的分析，批評高度資本主義發展後的破碎社會與商品符號。

三種閱聽人素養之間，並不是彼此互斥，而是相互增長的關係。迷群素養是該網站閱聽人皆具備的基礎素養，只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別；美學素養與智識素養，則因不同閱聽人特質而有所差別。若以線上身份與線下身份之間的關係來看，線上身份等同於線下身份者，其所發表之

循環文本透露出較多的美學素養與智識素養，而迷群素養則不一定，特別是無須特別說明即可將線下身份與線上身份連結者，如賴明珠、李友中、楊照、劉黎兒等已享有既定權威位置的專業寫作者，屬於社會中的文化菁英。相對於此，正在從事村上相關論述建立、主動說明線下身份者，如朗天、許均瑞、趙佳誼、柯杰光等人，仍未建立既定權威地位而展現較多迷群素養，可能企圖藉由系統性迷群素養的培育來增長其他素養之養成。以 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區分的閱聽人連續光譜而言，他們皆傾向於「小規模生產者」，擁有較佳的文本鑑賞之技術能力與分析文本特質的分析能力。

然而，大多數無法判定其線下身份之閱聽人，其展現之迷群素養程度差距相當大，多數閱聽人具有單本或數本村上作品閱讀所累積之迷群素養，但展現具有作品出版背景、村上本人背景或從事「村上考古學」之迷群素養者較少。大多數的閱聽人仍屬於初級（單本村上作品閱讀）或普通級深度（數本村上作品閱讀）之迷群素養，具有極致深厚之迷群素養者仍為少數。相對於線上身份等同於線下身份者，其展現美學素養與智識素養亦是較少。以線上身份建立之人數來看，閱聽人於循環文本所展現出之閱聽人素養，類似金字塔形狀，多數人位於底層、具有初級或普通級迷群素養者，越往上層則人數越少；合併具有美學素養或智識素養之閱聽人，亦屬於少數的金字塔尖端。

## 肆、重新思索「閱聽人」概念

傳統閱聽人研究，均將研究對象鎖定於「普羅大眾」階級，無論是 Morley(1980)《全國觀眾》、Radway(1987)羅曼史研究或 Ang(1985)的肥皂劇研究，研究者均站在以知識份子的角度，試圖瞭解平民百姓（或稱「俗民」）如何理解、接收或抗拒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媒介文本內容。此種做法容易陷入「菁英份子 vs. 普羅大眾」、「接受主流意識形態 vs.

抗拒主流意識形態」或「文本 vs. 閱聽人」之二元對立的桎梏，將原本混雜、不斷流動變化、異質性的閱聽人認同身分，視為單一、純粹、同質性高的閱聽人群體，忽略閱聽人本身存在著複雜認同變換。

經過上述實證經驗分析，本研究發現閱聽人於網路虛擬世界展現的線上身份組成是多變的，閱聽人的素養會因其不同的身份背景、嗜好興趣、關心議題甚或學術訓練等而有所不同。即便同樣是村上迷群，亦存在多種素養組合樣態，他們並非是經由村上作品洗禮後的「均質」群體，而是每個人都存在著其獨特的素養「面孔」，網路上的社群集結不過是「意見與品味的意外相逢」(in the accidental similarity of opinions and tastes)(Jones, 1998: 23)，人們不過是僥倖、偶然地在網路遇見與自己意見或品味相同的群體，雖然具有共同的興趣，但只是「碰巧在同一時間朝向同一方向」。

因此，本研究認為應以相對概念來指稱閱聽人，將閱聽人視為相應於文本而生，凡是直接或間接閱讀某個文本影像之人，都視為具有閱聽人之身分角色。因此，無論人們於現實生活的其他認同身分是男是女(性別認同)，是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家庭角色)，是藍領階級或白領階級(工作階級)，是學生、上班族或退休者(生命歷程)……，只要翻開小說、坐在電視機前面或是進入電影院，閱聽人身分即便浮現，而其他身分認同的角色穿插出現、交替影響人們於閱聽人身分時對於媒介影像的解讀、瞭解與意義生產。

此類相應於村上文本而生的閱聽人，不管其於真實世界扮演的職業角色或社經地位，只要曾經拿起村上作品閱讀，村上文本就已經向他們開展(perform)，因此，他們皆可視為環繞在村上作品形成的閱聽人。相對於行為典範將閱聽人視為均質的先驗閱聽人或接收分析典範將閱聽人視為對抗宰制權力核心的情境閱聽人，此種觀點是從重新將閱聽人的身分回歸到基本「人」的本質，承認其多元、混雜、糾結、交錯的身分認同位置。

## 一、對於閱聽人研究典範的啓發

本研究經由實證經驗研究，提出將閱聽人的身份位置回歸多元紛雜之人類本質的觀點，對於現階段閱聽人研究典範的發展，提出三點建議。

### (一)思考後現代主體的可能

黃靖惠(2003)從社會學觀點重新檢閱台灣閱聽人研究時，提出「綜觀台灣的傳播研究，除了文本分析之外，在閱聽人方面似乎尚未以後現代主義為基礎進行實徵研究」(p.97)。本研究雖然亦非基於後現代主體進行的閱聽人實徵研究，但對於閱聽人主體建構的發現，卻呼應著後現代主義下的主體觀。

後現代主義的主體觀不再對缺乏統一性感到焦慮，反而以慶賀的態度揚棄二元對立，藉此強調流動、多元、邊緣、差異與曖昧含混(廖炳惠，2003: 25)，而網路經驗更鼓勵贊同多元化、彈性的後現代心理模式，鼓勵人們想像自己是流動、突現、去中心且逐漸成型的主體(譚天與吳佳真譯，1998: 377)。Poster(1995)宣稱網路建構出「後現代主體」(the postmodern subject)，因為網路打破一對一的身體與主體關係，個人因而可以任意變換符號身份，進而發展流動且斷裂的身份認同。吳筱玫(2003)以「創造、流動、解構、解放、並置」等後現代特質指稱網路虛擬世界的文化特質。

後現代學者 M. Foucault 曾經提出論述(discourse)是一個持續生產、轉變和再生產的場域，它具有人們生產社會主體與自我認知的建構力量(Fairclough, 1992)。人們在網路空間透過論述所建構出來的第二自我，更加強或個人為了培育某種獨特風格而將知識與技術運用到自我身上的做法。林宇玲(2001)便曾運用其自我技術(the technology of the self)的觀點，探討人們於網路上的主體建構。面對網路媒介的蓬勃發展，閱聽人研究不宜再將閱聽人視為一個統合整體，而應更加重視閱聽人群體間的差異、彼此間的衝突，並在此人人皆可透過網路發聲的時代，關注

其主體建構的轉變。

## (二)閱聽人於反身性思考時的跳躍

第三代接收分析<sup>(12)</sup> 時代來臨之際，Hoijer(1999)、Morley(1999)與 Alassutari(1999)均同時提出，閱聽人於接收分析典範之後的新典範發展趨勢，首重閱聽人的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他們認為閱聽人對於「自己身為閱聽人」的事實會影響其對閱聽行為的評判，例如認為看報紙比看電視高尚，看電視新聞又比連續劇更具正當性等，閱聽人已經對於自己的閱聽行為道德階層(moral hierarchy)的判斷。

本研究於經驗研究資料整理發現，閱聽人的反身性思考，不只是發生於其位於閱聽人身份位置之時，他們同時會以自己非閱聽人位置的身份觀點，進而詮釋自己閱聽行為的展現。例如專業譯者賴明珠曾自我表明，當她以讀者身份解讀村上作品時，亦與一般讀者一樣，會對於不同的村上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喜愛或感受；放下專業，她也曾有過如同一般讀者一樣的感動與偏好。此時，閱聽人位置勝於其非閱聽人位置的思考，專業者（非閱聽人解讀位置）體會到非專業者（閱聽人解讀位置）的閱讀感受。

反過來說，非閱聽人位置亦可能介入閱聽人位置的思考，再如小說家徐錦成談論其閱讀心得時，亦曾表明「做為你（指村上）的同行，對這本書，我是有點嫉妒的。」。此時，徐錦成的非閱聽人位置（小說家），即介入其以閱聽人位置（讀者）對於村上作品的解讀與評判。因此，閱聽人不只是在站在閱聽人位置對於自己的閱聽行為進行反身性思考，他們是不斷跳躍於不同的身份認同位置之間，反覆思索文本意義與其對自身的影響。

## (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權力流動

閱聽人研究自從第二代接收分析開始，引進來自人類學的民俗誌研究方法，原始人類學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經常從在於「殖民母國



研究者 vs. 殖民地人民」的關係，研究場域亦經常以非洲、印尼等未開發領域之原住民，使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隱含著上對下或高對低的關係。然而，謝國雄(1997)以企業家為研究對象時，即發現此種上對下的研究關係已經被翻轉過來，而翁秀琪(2000)以女報人為研究對象時，更進一步以知識與社會階級作為區分標準，區分出八種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權力關係，呈現出多元複雜權力運作樣態。

本研究以閱聽人為研究對象，於研究過程亦發現，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是複雜且流動的。相對於翁秀琪(2000)以知識與社會階級作為區分準則，本研究則發現「素養」較適用於網際空間的研究領域，一方面，由於來自網際空間的研究文本，使得閱聽人實際世界的社會階級成為難以判斷辨別的项目，社會階級的影響已經消融於文字話語，轉換為資訊的形式呈現，另一方面，此種以資訊形式出現的知識基礎，是閱聽人於日常生活長期累積的結果，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展現於文本，因此本研究以「素養」稱之。因此，本研究修改自翁秀琪(2000)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圖」，將二者之間的關係以下表呈現：

表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圖

	研究者素養高	研究者素養低
研究對象素養高	I	II
研究對象素養低	III	IV

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素養均高時，二者的權力關係位於第一象限；研究者素養低，而研究對象素養高時，位於第二象限；研究者素養高，而研究對象素養低，位於第三象限，研究者素養與研究對象素養均低時，則位於第四象限。第一象限與第四象限的權力關係是對等的，而第二象限與第三象限的權力關係則是不相等的。

傳統閱聽人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較少出現於第

二象限與第四象限，因研究者的知識份子角色，鮮少發生研究者素養較低的情況出現。但是，本研究發現，由於素養的組成成份與因素複雜，研究者所具備的素養不一定均高於研究對象。如前所述，閱聽人來自四邊八方，閱聽人角色位置只不過是其眾多身份認同位置之一，他們可能於各自專業領域具有不同的知識、累積不同的素養。以語言素養為例，熟稔日文之閱聽人如賴明珠、李友中、銀色快手或小魚等，即比不諳日文之研究者，具備更多的語言素養；再以以音樂素養為例，喜好且精通爵士樂之閱聽人如朱中愷、歆儀、Join 等，亦比不熟悉爵士樂之研究者，具備較深之音樂素養。

再者，由素養所形成的權力關係，並不是固定不動的關係，而是隨著不同的素養而相互競爭、變化，例如討論音樂相關議題時，具有深度音樂素養之閱聽人擁有較高的權力關係，但是此權力關係並不一定同樣存在於村上作品意義的討論。換言之，面對不同的討論議題，產生不同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而此權力關係是流動且變化不一的。

本研究在面對此種研究對象的素養深度與知識權力經常高於研究者的現象時，所採取的研究態度是試圖與此權力關係斷裂，將焦點回歸「理論關懷」的研究層次。如同謝國雄(1997)所說，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心之所繫」不同，研究者關心的是知識理論的啟發，而研究對象則是試圖從作品文本的撰寫去挖掘自己的生命意義，因此，即便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經常因不同素養而存在著不同的權力關係，但是於理論關懷層次上，本研究則嘗試與此權力關係斷裂，經由蒐集與比較不同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呈現，重新建構研究對象。

## 二、結語與檢討

本文以閱聽人的主體性概念為中心，檢討各閱聽人研究主要發展典範對於閱聽人概念的本質論預設與方法論觀點，並藉由實際經驗資料的分析觀察，建議未來閱聽人研究應本研究認為應將「閱聽人」概念回歸到作為「人」之基礎的混雜多元認同角色。因此，本文對於閱聽人研究

未來發展提出三點建議，一是關注後現代主體建構的可能，二是閱聽人反身性思考不只發生在閱聽人對於閱聽行為的反思，亦發生在其對於人生道德價值體系的反思，三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權力關係開始變化與流動。此三點建議，是基於網路實證研究經驗出發，是否得以推論是非網路研究場域，值得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遭遇最大之困難點，在於難以確認閱聽人線上身份之轉換。若能瞭解閱聽人線上身份之轉換，將有助於瞭解其思辨歷程的演變，但是由於網路空間賦予閱聽人得以去除線下身份標記、自我操控線上身份建立之權力，使得閱聽人有權決定其線上身份建立之生死年限或是否同時建構數個線上身份等。本研究曾經考慮，若以投稿者寄發文件之 IP 位置作為辨別基礎，將可初步比對虛擬化身之轉換，但是此項做法卻有來自二方面考量的困惑，一方面，投稿者寄發文件之 IP 位置屬於時報文化公司的商業機密與其對投稿者的保密承諾，即便經時報文化公司同意提供相關資料，但仍是於未取得投稿者同意之情況下進行比對，因此產生研究倫理的問題；另一方面，閱聽人主動進行線上身份的轉換，必定存在某些主觀因素考量（例如迷群態度轉變或從村上迷轉到反村上迷等），在尊重閱聽人主動建立線上身份之權力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強行比對其線上身份的轉換呢？因此，在眾多考量下，本研究雖然以作者名稱（筆名或姓名）作為主要判定線上身份建立的標準，輔以相關資料收集以判斷線上身份的轉換，但是相關問題的考量如研究技術或研究倫理等，仍值得進一步討論。

##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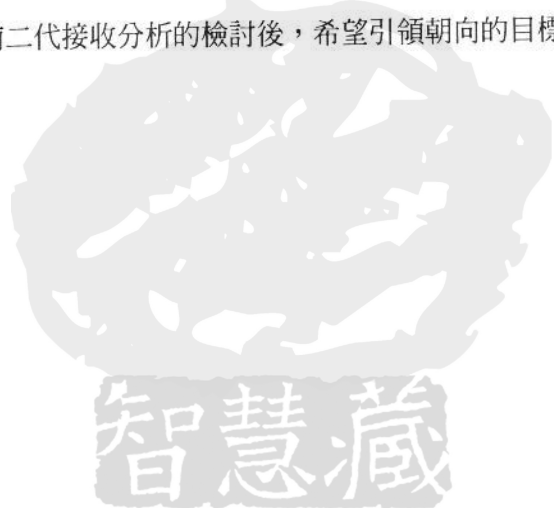
- (1) 1920年代，觀賞電影成爲美國社會最普遍的休閒活動，而大量兒童接觸充滿愛情、犯罪與性爲題材的電影內容，讓保守人士擔心電影會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民間慈善機構佩恩基金會便出資，由電影研究評議會(Motion Picture Research Council)主席 W. H. Short 帶領眾多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與教育學家，共同研究電影對兒童的影響。研究執行期間自 1929 年至 1932 年，共成就十三項研究，研究結果普遍支持電影會對兒童與青少年產生不良影響，促成電影業者對於影片內容進行自我監督。Lowery & De Fleur(1998)稱佩恩基金會爲美國傳播研究的第一個重要里程碑。參考自 Lowery & De Fleur(1998), pp.31-54。
- (2) 黃光玉(2002)曾經在〈再探「主動的閱聽人」之核心意涵：質化與量化的異同〉一文，重新從質化與量化兩方觀點，探討雙方對主動閱聽人概念的詮釋。她認爲量化的經驗學派並不是否認閱聽人主體性的存在，而認爲閱聽人的主體性是反映在閱聽人對媒介訊息所做的認知處理，只是多數質化研究學者因受限於學術專長背景的限制而未能瞭解。黃光玉(2002)擴大主動閱聽人概念的處理，使之具有較豐富的理念意涵，而本研究於此僅將主動閱聽人的概念限制於使用與滿足理論之下，因以「功利性主動閱聽人」稱之，避免混淆。
- (3)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參考自 Blaikie(1993), pp.69-77。
- (4) 文章出處爲 Hall, S.(1974).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 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 No. 7*.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本文轉引自 Alasuutari (1999), p.2。
- (5) Hall 同時提出專業性符碼(professional code)，專業性符碼有其技術性實踐的本質(technico-practical nature)，它經常爲主流霸權符碼

提供看似中立性的技術，例如影像的編排、問題的選擇、報導的角度、媒介接近權的結構等。專業性符碼並不是公然地展現他們的偏差，而是在無意識中、非故意地產製主流意識形態。

- (6) 對抗性符碼屬於抗拒(resistance)行爲，但是抗拒並不同於對抗性符碼位置。Hall 提出的對抗性符碼，認爲閱聽人可以拆解主流優勢意義，重新賦予意義框架，這是屬於抗拒閱讀；但是抗拒的概念，在 Radway(1980)等人的運用下，被視爲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閱讀行爲本身也可以成爲抗拒，而不見得要採取對抗性符碼位置閱讀才行，例如女性閱讀羅曼史，即使認同書中女主角的幻想，也就是採取主流霸權位置閱讀，但是由於閱讀行爲本身是一種逃脫父權制度下的壓迫，因此也是一種抗拒的行爲。
- (7) 村上出生於 1949 年日本京都伏見區，屬於日本戰後嬰兒潮的團塊世代，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演劇科，曾參與日本著名學生運動「全學共鬥會議」。少年時期開始受英美小說影響，三十歲(1979)開始發表作品，以長短篇小說爲主，曾得過「群像新人文學獎」(1979)、「野間文藝新人獎」(1982)、「谷崎潤一郎獎」(1985)與「讀賣文學獎小說獎」(1996)，被視爲日本繼夏目漱石之後最重要的作家。迄今爲止，村上共創 56 本作品，其中 36 本已由時報文化公司翻譯爲中文出版，換句話說，64%的村上作品已於台灣書籍市場流通。
- (8) 本研究所使用之人名，均以其在網站中發表文章之筆名。
- (9) 相關資料出處，參考自羅竹風主編(1997)：《漢詞大辭典》，第九卷，第 728-741 頁，第十二卷，第 517 頁-518 頁。台北：東華。
- (10) 考古學原指「以過去人類所留下的遺物、遺跡等材料爲基礎，推究人類社會、文化以及歷史發展的學問。」此定義引自教育部國語辭典，網址爲「<http://140.111.1.22/mandr/clc/dict/GetContent.cgi?Database=dict&DocNum=66589&GraphicWord=yes&QueryString=考古學>」。
- (11) 全名爲「全學共鬥會議」，著名的日本學生運動，發生於 1976 年前

後的日本大學，有別於傳統大學既成之學生自治組織，是由新左翼當派和無黨派學生所策劃之學生運動，抗爭高度資本經濟成長造成之價值體系崩毀。

- (12) 第三代接收分析的概念是引自 Alassutari(1999)的分類系統。Alassutari 將接收分析典範分為三代，第一代接收分析自 1974 年霍爾提出的原始模式開始，第二代接收分析則是 Hobson(1982)、Ang(1985)等人將民俗誌研究方法引入接收分析，並關注詮釋社群在日常生活的媒介使用，第三代接收分析則是 Alassutari(1999)本身對於前二代接收分析的檢討後，希望引領朝向的目標。



## 參考書目

- 方念萱、蘇彥豪（1998）。〈網路傳播中的對話與對峙：以女性主義連線版的言說為例〉，《新聞學研究》，56：183-218。
- 朱全斌（2001）。〈從主體、認同看質化的閱聽人研究〉，《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7(4)：69-79。
- 吳筱玫（2003）。〈解析 MUD 之空間與時間文化〉，《新聞學研究》，76：13-42。
- 吳翠珍（1996）。〈媒體教育中的電視素養〉，《新聞學研究》，53：39-59。
- 吳翠珍、關尚仁（1999）。《媒體、公民、素養——媒體公民教育訓練》。台北：富邦文教基金會。
- 林宇玲（2001）。〈由傅柯的自我技術觀點來看網路的主體建構——以世新大學不同性傾向的學生之線上互動經驗為例〉，「2001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巨流。
- 翁秀琪（2000）。〈多元典範衝擊下傳播研究方法的省思：從口述歷史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談起〉，《新聞學研究》，63：9-33。
- 郭良文、林素甘（2001）。〈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之比較分析〉，《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7(4)：1-13。
- 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台北：遠流。（原書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黃光玉（2002）。〈再探「主動的閱聽人」之核心意涵：質化與量化的異同〉。「2002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台北：世新會館。
- 黃靖惠（2003）。〈社會學對媒體閱聽人研究之啓示〉，《中華傳播學刊》，4：79-108。
- 葉啓政（2003）。〈傳播媒體科技庇蔭下的天命？〉，《中華傳播學刊》，4：3-67。
- 廖炳惠（2003）。《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北：麥田。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研院社研所籌

備處。

- 譚天、吳佳真譯 (1998)。《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台北：遠流。(原書 Turkle, S. [1996].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 Abercrombie, N. &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 Alasuutari, P. (1999). Introduction: Three phases of reception studies.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en new agenda* (pp.1-21). London: Sage.
- Anderson, J. A. (1996). The pragmatics of audience in research and theory. In J. Hay et al. (Eds.), *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 (pp.75-96). Boulder, CO: Westview.
-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 Blaikie, 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Polity.
- Blumler, J. G. & E. Katz (Eds.) (1974).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lster, P. (1997). *Digital literac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Gray, A. (1999). Audience and reception research in retrospect: the trouble with audiences.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e new agenda* (pp.22-37). London: Sage.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128-139). London: Hutchinson.
- Hay, J. (1996). Afterword : The place of the audience : Beyond audience studies. In J. Hay et al.(Eds.), *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 (pp.359-378).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Hoijer, B. (1999).To be an audience.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e new agenda* (pp.179-194). London: Sage.
- Jensen, K. B. (1996). After convergence: Constituents of a social semiotics



- of mass media reception. In J. Hay et al. (Eds.), *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 (pp.63-74).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Jones, S. G. (1998). The internet and its social landscape. In S. G. Jones (Ed.),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cybersociety* (pp.7-35). London: Sage.
- Jordan, T. (1999).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 Lowery, S. A. & M. L. Defleur. (1988).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New York: Longman.
- Morley, D. (1999). 'To boldly go...':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reception studies. In P. Alass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e new agenda* (pp.195-205). London: Sage.
- Morley, 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Murphy, P. D. (1999). Media cultural studies' uncomfortable embrace of ethnograph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3(3), 205-221.
- Poster, M (1995). Postmodern virtualities. In M. Featherstone & R. Burroes (Eds.), *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pp.79-95). London: Sage.
- Potter, W. J. (1998). *Media literacy*. California: Sage.
- Radway, J. (1987).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 Roscoe, J. et al. (1995).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aken-for-granted terms 'active' 'social' and 'critic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1): 87-108.
- Ruddock, A.(2001). *Understanding audiences: Theory and method*. Sage: Thousand Oaks.
- Schroder, K. C. (1999).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Media audience research between rival paradigm. In P. Alass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e new agenda* (pp.38-68). London: Sage.
- Watson, N. (1998). Why we argue about virtu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hish.net fan community. In S. G. Jones (Ed.),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 communication in cybersociety* (pp.102-132). London: Sage.



##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Audience: The Case of the Internet

Yu-Pei Chang\*

### Abstract

The meanings of “audiences” vary across the current paradigms of audience research, which tend to espouse different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behavioral paradigm and the reception study paradigm and then proceeds to examine the subjectivity as defined by different paradigms. Based on my four years working as an ethnographer in an online fan communit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udience research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versified, fluid, and hybrid identities of the audience.

**Keywords:** methodology, reception analysis, audience, audience research, internet

智慧藏

---

\* Yu-Pei Ch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